

美援文化下文學流通與文化生產

——以五〇、六〇年代童真於香港創作發表為 討論核心*

王鈺婷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本文以五〇年代台灣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童真於香港的創作發表做為討論焦點，來探察五、六〇年代台港文學交流現象，並思考童真作品所具有跨區域傳播的意涵，以呈現出台港文學場域結構之間的互動。五、六〇年代童真在美國新聞處資助於香港設立的相關出版刊物上發表作品，也透過美援文化的影響，和香港文壇出現具體接觸，發展出台港之間特有的文學聯繫管道。本文以五、六〇年代台港文壇特殊的冷戰和美援文化格局，此一構築當時華文世界文藝創作平台的重要社會背景，來檢視台港跨界的文學流通之現象。於此一背景下，深入釐清童真於香港文壇所進行文化生產現象，以梳理其作品之具體特色，並藉此呈現出五、六〇年代台港文學複雜的文化政治意義，以探察五、六〇年代台灣與香港之間的文學關聯與交涉互動。

關鍵詞：童真、美援文化、冷戰局勢、台港文學交流

* 本論文為103年度國科會計畫部分成果，計畫名稱：「跨界、交流與文化生產——以五、六〇年代童真與郭良蕙的香港文學發表活動為討論核心」（MOST103-2410-H-007-053-）。本文初稿宣讀於2014年10月24-25日由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主辦之「台灣文學研究新視野：反思全球化與階級重構國際學術研討會」國際研討會，感謝論文評論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應鳳凰教授之寶貴意見，與會議主持人東華大學華文系須文蔚教授之相關建議，及會中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黃淑嫻教授與日本早稻田大學張文菁博士之相關提問；修改稿發表於2014年11月19-20日由中國廣州暨南大學、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承辦「首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國際研討會，感謝論文講評人北京大學中文系計璧瑞教授之寶貴意見，並感謝「華文女性文學的世界圖景」專題論壇主持人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女性文化研究發展中心王紅旗主任；最後並感謝《台灣文學研究學報》審查委員之專業意見。

Examining the Cross-regional Exchange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under the U.S. Aid Culture:

An Analysis on Tong Zhen's literary work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Wang Yu-Ting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aper examines the literary work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Tong Zhen (T'ung Chen), a popular and active Taiwan-based novelist in the 1950s. The objectives of this examination are to better discern the active literary intercourse between Taiwan and Hong Kong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and to study the cross-regional literary meaning of Tong Zhen's works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circles of these two areas. Tong Zhen published regularly in Hong Kong-based publications which were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the U.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 Furthermore, the influence of postwar U.S. aid culture facilitated her relationship with Hong Kong's literary community. As a result, it gave her advantage to create and nourish the special literary bond which existed in the mid-late 20th century between Taiwan and Hong Kong. This paper first examines the literary intercourse between Taiwan and Hong Kong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shared cultural milieu created by the Cold War and U.S. aid culture, and then explains the unique character of Tong Zhen's Hong Kong-published work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ross-regional intercourse. Finally, the literary relationship and related interac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Hong Kong during these two decades are investigat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mplicated sociopolitical forces that affected the respective literary outputs of Taiwan and Hong Kong at that time.

Keywords: Tong Zhen, U.S. Aid Culture, Cold War, Taiwan-Hong Kong Literary Exchange



美援文化下文學流通與文化生產

——以五〇、六〇年代童真於香港創作發表為 討論核心

一、前言

台港之間密切的互動，始至1949年後香港特殊的政治文化境遇。49年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分立於海峽兩岸，由於香港獨特的英殖民地環境，使得香港成為國共政治對峙下的中立者，與雙方意識型態競逐的戰場。此外，由於香港位居中國大陸邊緣第一線，也使得香港成為美蘇冷戰佈局的一環，在台灣、中國、香港三地中，香港的重要性與特殊性不容小覷，而香港獨特的地緣政治，也促使台灣與香港在政治、文化上直接接觸與頻繁互動。目前台灣學界對於台港文學交流的研究也累積了具體成果，主題涵蓋五〇至七〇年代台港跨區域文學傳播現象、冷戰時期的美援文化事業與文化交流現象、香港南來文人的文化活動等面向，包括：李瑞騰、單德興、須文蔚、陳建忠、蘇偉貞、應鳳凰、游勝冠、陳國偉、簡義明等多位學者皆展現了多元豐碩的研究面向；其中台港文壇跨區域交流現象，是台灣學者從台港兩地的雙重視野與比較框架，來剖析台灣文壇與香港文壇交織的互動關係，如須文蔚致力於現代主義、意識流理論等具有影響力的文藝思潮，在台港文藝場域的跨區域傳播現象；¹ 以及簡義明從保釣運動相關史料，來圖誌台港跨地域文藝思潮的形構。² 近年來筆者也對於五、六〇年代台港文化交流現象十分感興趣，筆者針對五、六〇年代台灣女作家在香港文壇的發表現象進行資料蒐集與相關研究，亦發現有不少台灣的女作家在香港美援刊物中所舉辦徵文活動中頻頻獲獎，或是將作品投至香港

1 須文蔚，〈余光中在一九七〇年代台港文學跨區域傳播影響論〉，《台灣文學學報》19期（2011.12），頁163-190；〈1960~70年代台港重返古典的詩畫互文文藝場域研究——以余光中與劉國松推動之現代主義理論為例〉，《東華漢學》21期（2013.10），頁145-173。

2 簡義明，〈冷戰時期台港文藝思潮的形構與傳播——以郭松棻〈談談台灣的文學〉為線索〉，《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8期（2014.04），頁207-240。

報紙或是文藝刊物。關於五、六〇年代台灣的女作家在香港的發表現象及其展現樣貌，以及女作家如何連結起台港文壇的互動，尚需要進行更完整的資料蒐集與比較研究，並放入整體性的框架進行檢視，才能成為台港文學場域之間有意義對話與相互參照。本文將以五〇年代台灣具有代表性女作家童真於香港的文學發表活動做為討論焦點，來探察五、六〇年代台港文學交流的重要現象，以了解香港文學場域接受台灣作家作品的過程，並描繪出台港文壇交流關係的歷史縱軸。

目前台灣學界關於童真的研究專論並不多見。童真的研究，主要來自於范銘如的「台灣新故鄉」之論述，此一論述也對於五〇年代女性文學評論模式影響深遠，並發掘出童真小說的獨特價值。范銘如以童真小說作為建構五〇年代女性文學傳統之例證，指出五〇年代女性小說在家台灣的實際書寫中，思考重建家園的困境與方法，並塑造心靈之原鄉，也突破當時官方大敘述與家國視角，並進一步從其性別身分來重塑女性的家國想像。范銘如論證童真〈穿過荒野的女人〉一作，剖析女性離開象徵父權結構的大陸，在台灣獲得重生，得以建構自我的主體性：「女主角在三個叫做『家』的空間中遷移的過程促使我們留心，女性的家往往不只一個。女性的主體性也常常隨著不同的空間文化而建構，不管是被迫或自主。……女作家拒絕懷舊／鄉的共鳴，因為過去並沒有提供她們如男性一樣的資源。因此相較於男性的頻頻回首，柔腸粉淚，女性顯然樂於振翅高飛，迎向未來。」³〈台灣新故鄉——五〇年代女性小說〉之論述，不僅提升童真小說的能見度，也調整五〇年代因循已久的評論視野，並且使得五〇年代女性文學受到廣泛的注意。陳芳明在《台灣新文學史》中，對於女作家著墨甚多，將女作家的地位放在文學史的脈絡予以探討，陳芳明也特別標舉童真文字藝術的高度，認為童真：「童真的文字頗為生動，擅長以外在風景來襯托內心世界。」⁴對於童真文字藝術造詣十分推崇。而在詹馨怡的〈童

3 范銘如，〈台灣新故鄉——五〇年代女性小說〉，《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8.08），頁30-31。

4 陳芳明，〈一九五〇年代的台灣文學侷限與突破〉，《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11）。

真小說研究〉中，企圖重估童真在台灣文學史的地位，並且回應目前台灣學界從五〇年代女性文學在地化書寫和女性書寫展現的藝術高度此兩大面向，來標舉出童真作品的特質。⁵

童真在1951年踏進台灣文壇，其創作生涯始於隨任職台糖的夫婿居住在花蓮光復糖廠宿舍時期，因為排遣長子夭折之痛，而將愁緒轉移到創作上，童真創作以小說為主，發表在《新生報·副刊》、《自由青年》、《幼獅文藝》、《自由中國》、《文學雜誌》、《文星》等報刊雜誌上。童真創作第一階段的高峰期是在1958年至1960年，三年之間發表了幾十個短篇小說和四個中篇小說；1961年夏秋之際，因為照料四個兒女與寫作耗損體力，因而病倒，第二階段的創作高峰期在1962年至1973年間，尤其是1962年是童真豐收的一年，除了在《中華日報·副刊》上連載《愛情道上》，在香港出版了四部小說集，1963年後在台也陸續出版《爬塔者》、《霧中的足跡》、《彩色的臉》、《車轢轢》、《夏日的笑》、《寂寞街頭》、《寒江雪》等小說集。⁶ 1977年童真停筆後，直到九〇年代中旬才又在《文訊》上發表散文創作。童真於1952年至1973年期間出版六部長篇小說、十部中短篇小說，2005年文史哲出版童真自選舊作的自選集，一共七本。

童真在香港的發表情形，目前可見資料為作者自述寫作歷程之相關篇章，以及童真接受媒體所進行的採訪資料。其中童真自述其筆墨生涯〈我的創作之旅——一次小小勝利〉；⁷ 以及鐘麗慧的〈「鄉下女作家」童真〉，⁸ 最值得參考。童真在自述與採訪中提及1955年，她以一篇〈最後的慰藉〉獲得香港《祖國周刊》短篇小說徵文亞軍獎（李白金像獎），童真提到此一獎項給予她莫大的鼓勵，童真在自述其寫作生涯提到此一小小勝利後：「我告訴自己：我要勤奮地寫下去，希望有一天能寫出一些具有份量的小說。」⁹ 童真提及由於此次徵文獲獎，香港報刊多來約稿，除了《祖國周刊》外，亦在《大學生活》、

5 詹馨怡，〈童真小說研究〉（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論文，2011）。

6 林麗如，〈時代的顯影——專訪童真女士〉，《文訊》244期（2006.02），頁20-27。

7 童真，〈我的創作之旅——一次小小勝利〉，《文訊》28期（1987.02），頁216-222。

8 鐘麗慧，〈「鄉下女作家」童真〉，《文藝月刊》190期（1985），頁13-20。

9 同註7，頁216。

《中國學生周報》、《文學世界》、《自由人》、《中外畫報》等報刊發表其短篇小說¹⁰。1962年童真也在香港文壇大放異彩，同一時間出版四部小說集，包括《黛綠的季節》（友聯畫報雜誌社）、《相思溪畔》（環球圖書雜誌社）、《懸崖邊的女人》（鶴鳴書業公司）、《紅與綠》（虹霓出版公司）。根據筆者初步資料的收集，童真除了在上述報刊發表作品，也在《純文學》與《華僑文藝》上發表相關創作，可見童真在香港發表現象頗值得矚目。

童真在美國新聞處所資助於香港設立的相關出版社上發表作品，也透過美援文化的影響，和香港的文壇出現具體接觸，發展出台港之間特有的文學聯繫管道。本文以五、六〇年代台港文壇特殊的冷戰和美援文化格局，此一構築當時華文世界文藝創作平台的重要社會背景，來檢視台港跨界的文學流通之現象。於此一背景下，深入釐清童真於香港文壇所進行文化生產現象，以梳理其作品之具體特色，並藉此呈現出五、六〇年代台港文學複雜的文化政治意義，以探察五、六〇年代台灣與香港之間的文學關聯與交涉互動。

二、童真與香港文壇接觸的起點——美援刊物文學獎

在五〇年代國際冷戰局勢的影響下，台灣與香港都受到美援文化的影響，皆籠罩在美國文化的勢力之下，尤其透過美新處有計畫資助文化活動，使得台港兩地文化圈呈現同步發展。關於此一時期童真在香港所進行的文化生產活動，如就童真當時所發表的報刊特質進行分析，可以發現五〇年代香港雖然有不同類型的綜合性文化刊物，童真顯然是在五〇年代冷戰局勢的場域外部條件之下，以其創作位置與香港文壇產生聯繫。五〇年代的香港，在港英政府相對寬鬆的態度之下，美援（元）文化相當蓬勃發展，正好與左翼文化活動之沉寂形成對比¹¹。右翼文化人在美援（元）文化的資助下成立出版社，右派機構所主編一系列刊物，對香港以至於東南亞一帶的文藝發展，都具有深遠的影響。

鄭樹森指出五〇年代由於美援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而使得台港之間文

10 同註7，頁217。

11 張詠梅，《邊緣與中心——論香港左翼小說中的「香港」（1950-67）》（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3.10）。

化、文學傳播益加密切，他指出1950年美方支持亞洲基金會成立，1951年該會資助友聯出版社，友聯以辦雜誌和從事中共研究為主，同年人人出版社亦受資助成立。1952年亞洲出版社成立，出版大量書籍，包括：文藝創作、中共問題、文學翻譯、連環圖、兒童讀物、青少年讀物等，約有四百多種¹²。友聯雜誌所出版的報刊，包括《中國學生周報》（1952年創辦）、《祖國周刊》（1953年創辦）、《兒童樂園》（1953年創辦），以及《大學生活》（1955年創辦）；人人出版社創辦《人人文學》（1952年創辦）；亞洲出版社發行綜合性月刊《今日世界》（1953年創刊），亦有在台灣可以正式發行的《亞洲畫報》（1953年創刊），《亞洲畫報》經常舉辦短篇小說徵文比賽，台灣的參賽者眾多。根據吳佳馨的觀察，自1955年至1962年間，《亞洲畫報》共舉辦八次短篇小說比賽，分為普通組與學生組，參賽者八成是台灣作家或是學生，可見《亞洲畫報》在台灣文壇有高度能見度，有不少台灣女作家於《亞洲畫報》短篇小說比賽中得獎¹³，包括郭晉秀、吳崇蘭、郭良蕙、嚴友梅、繁露、晶心、叢甦、徐蕙藍等，童真也在第二屆普通組得獎，當時除了《亞洲畫報》，《祖國周刊》與《中國學生周報》也曾舉辦短篇小說比賽與徵文比賽，這些比賽中有比例甚高的台灣女作家得獎，而童真與香港文壇接觸的起點，則是香港友聯雜誌《祖國周刊》所舉辦的短篇小說徵文比賽。

1955年童真以〈最後的慰藉〉獲得香港《祖國周刊》短篇小說徵文李白金像獎，名列亞軍獎，這也開闢了童真往海外發表的園地。《祖國周刊》所主導的文學獎具有什麼樣的審美品味？童真得獎現象該如何進一步解讀與分析？根據王梅香研究指出，《祖國周刊》為友聯出版社針對知識分子發行的綜合刊物，由祖國周刊編輯委員會主編，主要作者有齊桓、王敬羲、邱貞理（司馬長風）、燕歸來、宣建人、李素、徐亮之等人，該刊以分析、報導中共實況為刊物的基本內容，堅持反共立場，有時也刊載關於台灣現狀的時事與批評。台灣

12 鄭樹森、盧瑋鑾、黃繼持，〈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現象三人談〉，《中外文學》28卷10期（2000.03），頁11-39。

13 吳佳馨，〈1950年代台灣現代文學系統關係之研究：以林以亮、夏濟安、葉維廉為例〉（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8）。

作家除了童真之外，在《祖國周刊》投稿者，還包括：姚朋（彭歌）、潘壘、歸人等。¹⁴ 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童真的〈最後的慰藉〉，¹⁵ 釐清此部作品如何進入《祖國周刊》舉辦文學獎獲獎名單中，可將童真與香港文學場域進行互動式的觀察。

〈最後的慰藉〉描述好心的醫生假扮兒子，來完成臨終老婦的心願，使死者得到慰藉之故事。小說中福生嫂朝夕期盼逃亡的愛子歸來，另外一位主角老鄰居金醫師回到小村來開業，他發覺福生嫂為兒子埼埼的事，蒙受無盡的煎熬，在金醫師探視後，更引發福生嫂滿心的愁思。福生嫂在意識模糊下，為尋找自首的兒子，滿山遍林呼喚兒子，而後氣力殆盡，福生嫂回憶起十多年其夫被日人害死，兒子為支撐她活下去的主要動力，福生嫂在疾病轉劇之際，發出要活著看兒子的呼求，而小說最後高潮在於金醫生為讓垂危的福生嫂安心離世，遂假扮埼埼，在福生嫂床前跪拜，表明已向政府自首，而福生嫂也首次展露慈藹的微笑，撒手歸西。小說傳達出好心醫生的扮演，彌補老太太臨走的遺憾，具有強烈人道主義的關懷，小說的另一條主線則在於描繪知識分子埼埼受到共黨分子的引誘，而終至迷途的過程：

他本性的率真與淳厚，該搏得人們的讚美。然而，唯其因為太率真，太淳厚，所以才格外容易上當。在他誠摯的心眼裡，事情都顯得很單純；他容易把謊言當做真話，假意當做真情。在大學裡，他被一個同學的花言巧語所眩惑，把他引為知己，並且誤信了他的謬論，糊糊塗塗地加入不法的地下組織。¹⁶

小說中福生嫂被賦予傳播道德教化的意涵，期盼埼埼在政府寬大的政策下，重

14 王梅香指出1953年創刊的《祖國周刊》，於1964年改為《祖國月刊》，1972年改為《中華月報》，內容有五大要項：文藝創作、特約通訊、時事評論、學術論文、中共研究。《祖國周刊》由於刊載台灣時事的批評，曾於1958年12月起，一連十幾期都受到國民政府查扣，也曾受到《自由中國》的聲援。王梅香，〈肅殺歲月的美麗／美力？戰後美援文化與五、六〇年代反共文學、現代主義思潮發展之關係〉（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5），頁50。

15 童真，〈最後的慰藉〉，《祖國周刊》12卷8期（1955.11），頁25-29。

16 同註15，頁25。

新做個清白的人，整篇故事中，盧騷《懺悔錄》一再出現，成為一個重要的象徵，具有濃厚的道德寓意，也符合美援刊物所訴求的反共文藝觀。除此之外，這部作品也是歌頌母愛的佳構，福生嫂以母親的心情全心等待孩子回來自首，此一無私、犧牲自我的母親形象，亦是理想母親的代言人。〈最後的慰藉〉藉由《祖國周刊》短篇小說徵文比賽進入香港文學生產空間，也讓童真開啟與香港文壇接觸的契機，此後並經常在《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等美援刊物上發表創作。

三、童真於友聯雜誌出版相關作品之分析

童真於1957年至1965年在友聯雜誌支持的《中國學生周報》發表二十餘篇小說，童真的香港寫作生涯幾乎與《中國學生周報》同時發展，由於《中國學生周報》（1957.07-1974.07）創刊時期長達22年，歷經香港文化歷史的動盪，盧瑋鑾提到許多人將《中國學生周報》純然視為「美援文化」的產物，或是反共宣傳工具，然而盧瑋鑾認為《中國學生周報》「反共」意味，也不是由於「美援」，而是主持人的信念使然，並且認為《中國學生周報》成功之處在於引領青年人成長，體認與香港青年憂戚與共的獨特風格。¹⁷ 根據童真記敘她與《中國學生周報》接觸，也可以回應盧瑋鑾所觀察出《中國學生周報》的幾項特點，包括：編輯人多、園地公開、編者與讀者和作者之間感情的交流等特色。¹⁸

童真投稿於《中國學生周報》主要是來自於黃崖的約稿信，她提到於學報上所發表的小說，都是在編者先生的約稿信下催生出來，認為從黃崖、黃碩儒、盛紫娟等主持編務工作的先生們，都是熱誠親切、篤實負責，所以童真跨足香港文學場域，也歸功於文壇守門人的「欽賞」。童真並以「一個熱誠的年輕朋友」來描述《中國學生周報》的風格：「他是他同伴中的佼佼者，不僅面目清新、內容紮實，而且始終在以不懈的努力，追求著新境界。」¹⁹ 童真也特

17 盧瑋鑾，〈《中國學生周報》〉，《讀書人》26期（1997.04），頁72-75。

18 同註17。

19 童真，〈一個熱誠的年輕朋友〉，《中國學生周報》589期，1963.11.01。

別提到：「我總希望能把自己認為滿意而又適合於青年胃口的小說寄給他們，為這個年輕的朋友，也為自己這份欠下的情誼。」²⁰童真於《中國學生周報》發表的時間正好介於五〇年代末期到六〇年代中期，也在盧瑋鑾闡釋《中國學生周報》在創刊詞中「回應時代責任」的承諾，認為六〇年代中葉是此一刊物發展的重要分水嶺：「六十年代中葉以前，它的主要精神乃在發揚中華文化，闡釋民族大義、承繼三、四十年代的文藝傳統，與讀者共同體認文化民族的血緣關係。」²¹在此將分析童真於《中國學生周報》上發表的重要主題「懷鄉」，並且釐清童真的創作位置如何與香港文壇產生聯繫。

童真於《中國學生周報》上發表之重要主題，為故國舊事的懷想，具有濃厚的懷舊意識。〈老人與船〉²²故事設定父親年輕時跑船養家，離開故鄉來到台灣後，思鄉情切使得父親瞬間衰老，兒子希望陪他到高雄西子灣等地走走，但是他還是想留在自己的船上，眺望日昇日落，緬懷過往。兒子李樹青在經濟壓力下，將父親在大陸時期用以維生的船典當，並委請債務人姚先生向父親吐露實情，但是當姚先生聽到李樹青父親對於船的情感，以及父親表明有一天要乘著船回鄉的願景，姚先生體認到船隻與父親原鄉記憶之重大牽繫，說出：「別提這筆錢了！誰不像你老爹那樣，想回家鄉哪。」²³並放棄追討錢財。〈老人與船〉筆調低沉而哀傷，描述的是年老父親守著一艘破舊之船，並勾勒出此艘船對於父親的重要意義，在於懷鄉情緒之投射，小說中，透過意識流的技巧，藉由父親心靈活動的回溯，船代表了其父對於過往青壯記憶的追尋：

他睜大眼睛，望著海面以及他所自來的遠方。幾隻海鷗在海面上翱翔，像點點白帆。他的木船揚著帆在海上航行時，也是這樣的吧。船是應該航行的，不該老是泊著，猶如他自己，是應該在家鄉的，而不是老待著異地的呀！²⁴

20 同註19。

21 盧瑋鑾，〈《中國學生周報》〉，《讀書人》26期，頁72-75。

22 童真，〈老人與船〉，《中國學生周報》315期，1958.08.01。

23 同註22。

24 同註22。

〈老人與船〉故事呈現出由中國大陸遷居來台的人，無法忘懷故鄉的歲月。童真於《中國學生周報》發表的〈老樹濃蔭〉，²⁵以其擅長的意識流和心理刻畫手法，來鋪陳小說的情節，描述因戰亂而家人同樣困居大陸的「天涯淪落人」，彼此之間惺惺相惜的情感。〈老樹濃蔭〉描述從大陸來台的少女蘇曼，拒絕公營機關的工作，租下鄉間老屋以從事寫作，而寫作的動力是來自於希望大陸的母親能夠看到她書寫的東西：「她的那份對於留在大陸的母親的熱切的懷念與深摯的情愛，乃是她立意寫作的最大動力。」²⁶年輕的蘇曼，忍受著老屋的殘破與蒼涼，也忍受著黑鬱龍眼樹下黝暗的光線，主要也在於龍眼樹使其懷想遠在大陸的母親，有生命力的龍眼樹因而成為蘇曼懷念母親的重要象徵：「它朝朝跟她在一起，督促她工作，俯視她睡眠，關注她飲食，它還把手臂伸到窗口來，撫摸著站在窗前的她的臉頰。」²⁷

〈老樹濃蔭〉的屋主劉大奶奶是位本省籍的獨居老人，劉奶奶對於龍眼樹有份特殊的情感，主要是龍眼樹是女兒彌月時所栽種，而劉大奶奶的女兒跟著外省丈夫到大陸拜訪公婆，卻因戰亂而無法回到台灣，女兒名字為小蘇，恰巧與蘇曼雷同，於是老太太將情感投射至蘇曼身上，兩人經常對坐交談，懷想海之彼岸的親人。以寫作維生的蘇曼，作品一直不受矚目，在母親五十歲生辰大壽那天，她懷抱未盡孝道的遺憾，一邊寫封未能投遞之信給母親，一邊飲酒解悶，不幸得到了胃潰瘍，蘇曼只得將母親給的翡翠戒指交給劉奶奶請其變現，以償還醫藥費。故事終了，劉奶奶不捨蘇曼的戀母之情，於是將自己金鐲子典當，權充蘇曼的醫藥費，當蘇曼出院前，赫然發現翡翠戒指還在，蘇曼憶起劉大奶奶離開醫院時，不見往日所戴的金手鐲，文中以愛來傳達女性因戰亂而緊密聯繫的情感：「那翡翠油綠晶瑩，那金質閃爍光亮。她想，沒有一隻指環能比得上它，因為鑄成它的，是人世間最燦爛的東西：愛！」²⁸這部小說也著眼於台灣島嶼的族群議題，複雜化懷鄉主題的思索，不從省籍二分的概念來簡化

25 童真，〈老樹濃蔭〉，《中國學生周報》325期，1958.10.10。

26 同註25。

27 同註25。

28 童真，〈黛綠的季節〉，《黛綠的季節》（香港：友聯出版社，1962）。

懷鄉議題，反而呈現出懷鄉議題中的族裔多元性，流露出本省居民對於外省移民的關懷與善意，提示出用愛來思考族群交融的可能性，這也凸顯出童真在台灣投稿與發表，其文學位置與香港南來作家所具有的殊異性。

童真1962年於友聯畫報雜誌社出版的《黛綠的季節》，一共收錄五篇作品，這些故事也建立在遷台外省族群集體離散的時空背景。童真在此部小說集採取相當一致的書寫面向，創作以描寫愛情和親情主題居多，也同樣以女性心理為主要敘事觀點，小說中的男、女主角大多具有外省籍背景，因中國戰亂而被迫分離，再重逢已是世變境遷。童真創作此部小說的主題，便是圍繞在離散經驗底下的重逢際遇，「離散」是戰亂時代男、女青年的共同命運，他鄉重逢的戲劇張力，就在男、女主角如何面對塵封多年的秘密，以及回應現實生活的境況？小說集當中〈黛綠的季節〉與〈安排〉，都為處理「重逢」主題的兩篇小說。

〈黛綠的季節〉中如晶於父親驟逝後母親韶音帶其到高雄投靠同學蕙姨，蕙姨成天在外打牌，景平姨丈也忙於廠長工作，但對於寄宿的韶音母女卻是十分周到。小說的主線之一，在於如晶意外撞見母親與姨丈在大貝湖湖面上泛舟，得知何景平是媽媽離散20年的舊情人，但礙於現實所以選擇隱瞞。小說最後男女主角面對重逢當下的悸動，不曾溢出禮教規範，一致決定回歸現實生活，蕙姨決定戒賭回歸家庭，重拾婚姻關係，母親重新考慮孫祕書的追求。²⁹而另一篇〈安排〉也鋪陳以大局為重的結局，小說描述超華帶著女兒茵茵到好友家萱位於郊區新家渡假，家萱雖有幸福的家庭，然其內心思念當年因中日戰爭而分離的初戀情人金雪鴻，因而對丈夫有著極深的愧疚感。小說揭露超華以維持家庭的和諧為由，斬斷兩次家萱與舊情人重逢的機會，此次是超華女兒茵茵外出寫生，巧遇不知名的畫家金沙，兩人成為忘年之交，一日超華到金沙的畫室參觀時，發現金沙就是金雪鴻，畫室擺放描繪家萱年輕時的畫像，超華決定帶著茵茵提前結束行程返家，也堅信自己出自善意之謊言是對雙方最好的安排。³⁰

29 童真，〈黛綠的季節〉，《黛綠的季節》，頁1-101。

30 童真，〈安排〉，《黛綠的季節》，頁119-144。

〈黛綠的季節〉或是〈安排〉都描述主角人物內心的掙扎，展示道德衝突的情境，如〈黛綠的季節〉中韶音處於友情與愛情的兩難之中，〈安排〉中家萱則在往日舊情人的青春記憶與丈夫共處的現實時空中掙扎，無論是〈黛綠的季節〉中女主角以成全友人家庭來壓抑個人情感，或是〈安排〉中敘述者主動斬斷好友與舊情人重逢的機會，童真小說處理「他鄉重逢」的主題，最後都選擇回歸現實生活，維持理性結局，其中的關鍵點為女性情誼，〈黛綠的季節〉中韶音選擇女性情誼，與她不熟悉的人組成小家庭，以在台相互扶持；而〈安排〉中超華也在女性情誼的考量下，以保全女友幸福的現狀。這些以重逢為題的小說，其懷鄉主題也包括對於已逝戀情的追尋，與舊愛在台重逢，喚醒的無非是往事的記憶，除了個人懷鄉情感的宣洩之外，也包含族群集體離散的共同命運，因而引發歷劫來台後與親友異地重逢的敘事，因此可歸之為廣義的「懷鄉文學」。

四、童真與香港文學場域之互動——從地域性與通俗性來進行分析

童真在友聯雜誌所出版的相關作品，寫下動亂煙塵裡的集體命運，形構懷鄉的氛圍，側寫社群情感的牽繫，聯結懷舊與懷鄉。以下將凸顯童真作品進入香港的過程，釐清其是否受到香港文學場域的影響，呈現出不同的風貌，也進一步分析童真再現香港的書寫策略與美學特徵，以了解童真的作品與香港文學場域進一步互動的可能性。在上述《黛綠的季節》中〈日薄崦嵫〉³¹一篇，小說主題描述女主角對當年一段未竟愛戀之悔恨，女主角與舊情人重逢後，她在家庭倫理考量下，默默與舊情人握別，回歸到社會道德秩序對其的期待上。然而，〈日薄崦嵫〉值得注意之處，在於此部小說將女主角的生活空間設定在香港，刻畫出老朋友紀文嘉將前去星島，中途過境香港順道拜訪的時空場景，然而十分可惜的是，這部作品重心在於離散與重逢的戲碼，香港的風景與氛圍並不鮮明可辨。值得關注的是，童真的作品中，除了〈日薄崦嵫〉作品背景設定

31 童真，〈日薄崦嵫〉，《黛綠的季節》，頁145-155。

在香港，1962年出版的小說《懸崖邊的女人》，可進一步理解童真作品如何呈現香港圖像，並從跨文化語境的思考模式，開啟童真與香港對話的可能性。

首先，《懸崖邊的女人》此部小說的故事場景發生在香港，凸顯童真思考其作品與香港文學場域之交會，並促使作家於作品中展演香港的想像與再現。

《懸崖邊的女人》女主角丁韻的父親丁品仁，設定為南來人士，其父於中國曾是小學校長，在小說中描述其丁韻的父親「來香港十年，沒有一天不想找個工作，可是沒有一天不在遊蕩中過去」，這也側寫五〇年代初期的香港社會與難民潮，論者指出五〇年代初期的香港，南來人士雖然多為知識分子，但是面對人口與職位僧多粥少的惡劣現實，失業問題非常普遍，不少人屈就於完全無需學歷要求的勞動性行業。³²在香港文學中，趙滋藩的《半下流社會》、張一帆的《春到調景嶺》，與林適存的《鴛鴦》，都為描述香港難民的題材，刻劃出難民流離失所的生活，而《懸崖邊的女人》中父親丁品仁形象，就頗為符合香港艱困時期對於難民的觀察。

作品中童真藉由女主角丁韻的慘痛經驗，一則評價香港社會文化的勢利，著力刻劃出香港社會「以貌取人」的膚淺；一則具有大眾文化文本的機制，文中以純真無知的女主角最終得到愛情的獎賞，而寡情重利的壞男性受到懲罰，女主角迷途知返回到幸福美滿的婚姻，有情人終成眷屬為結局。小說的開頭，首先呈現出香港人的衣著文化，當清貧的丁韻首次要接受尹政面試時，她嘀咕著：「穿著這身洗得發白的花布西服去『應徵』，給人的第一個印象就不會太好，而在香港，人們又是憑藉衣著儀態去衡量人的。」³³小說中，「以貌取人」的主題，也在《懸崖邊的女人》中反覆演繹著，而十分反諷的是丁韻也陷入「以貌取人」的困境之中。小說標題「懸崖邊」指的是女性的處境，小說表明是丁韻由於自己的無知與虛榮將自己置身於險境之中。此部小說雖以「女人」為標題，但事實上是關於兩男一女的三角故事，全篇以第三人稱敘述觀點進行，圍繞在女主角丁韻「識人不清」的矛盾心理上，以諷刺女主角因迷戀仲

32 黃燕萍，〈「南來南國豈為錢」？——從五十年代初香港的難民潮談到南來文人在香港文壇的生存形態〉，《文學世紀》37期（2004.04），頁51-54。

33 童真，《懸崖邊的女人》（香港：香港鶴鳴書業公司，1962）。

宇外型，竟兩次蒙受欺騙的愚蠢行徑，其實和香港人注重行頭的盲目心態是如出一轍的。不同於一般小說大多描寫男性因注目女性亮麗外表而使其受騙，此部小說處理的是女性自身受社會因素決定的女性經驗，從女性丁韻的視覺感受出發，童真將木訥忠實的尹政與俊俏虛情的仲宇的品格並置，突顯出丁韻受外表蒙騙而無法洞悉人內在的性格。在此，童真也同樣設計丁韻家中兩組人物進行對照，一方是事業有成卻利益薰心的叔長輩，另一方則是一事無成但洞察人性的父親，如此兩相對照的敘事結構不僅彰顯戲劇張力，也側寫出香港大眾崇尚虛華的表象。此一小說具有大眾文化雷同的固定模式和常規，最後障礙排除，回到圓滿的結局，提供給讀者滿足的快感。

《懸崖邊的女人》最值得關注之處，在於小說巧妙融合香港地域特色。小說的主要場景建構在尹政位於新界的農場，在小說中，童真刻劃出新界農場一派田園風光的景象，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農場座落在一座小山近旁，佔地大約一萬多呎，作長方形，雖然不大，卻很整齊、清潔，看得出主人經營的用心之苦；進去是一條扶桑樹夾起的走道，左首一排芒果樹下，是三間小屋，專供工友起居及安放農具雜物之用；然後是一列雞舍，裡面養著兩千來隻來亨雞，雞舍之旁是羊欄……；正屋是紅頂灰身的西式平房，屋後的小小草地上，有幾株鳳凰木像綠傘似地撐在那裡，走道的右首乃是鳳梨園……³⁴

這樣香港地方書寫，形構新界的地域氛圍，有助於呈現地方想像，是否進一步凝聚香港在地讀者的認同？頗值得進一步觀察。小說藉由丁韻與李仲宇的熱戀，呈現出五、六〇年代香港男女約會的場所，透過這對年輕男女的愛情敘事，讓我們彷彿置身於香港約會的特殊空間，童真小說中所列舉的地景包括：荃灣、青山、元朗、香港仔、赤柱與淺水灣等，這些足以讓情侶徜徉在青山碧水之中，道盡綿綿情話的郊外風光，也投射出童真再現香港地誌文化想像。

34 同註33，頁6。

香港小說和大眾文化之間的糾纏關係，是歷來研究者所關注的主題，也斯曾提出香港是商業掛帥的城市，由於商業發展已久，產生雅俗混雜的文類，文人也發展出種種對抗或是解讀傳媒的方式，也斯並舉講述天空小說的李我和以通俗小說著名的三蘇為例，說明香港文學所具有的雅俗混雜的性格；³⁵ 羅貴祥分析六〇、七〇年代崑南、劉以鬯、西西與也斯小說中所表現的大眾文化觀念，說明香港本地的文學工作者往往要寄生於商業文化體制之下，在商品市場的隙縫中尋找生存的空間。³⁶ 香港文學往往與商品化、大眾文化意識聯結在一起，六〇年代童真於香港發表作品中也難以擺脫或抽離香港商品生產的模式，呈現出童真作品跨足「香港」的另類意涵，體現童真小說與香港大眾文化之間複雜的關係。

相較於童真在台灣發表的小說以寫實主義的精神正面探討女性的社會性議題，題材觸及女性於傳統封建禮教的束縛與家庭經濟困窘的兩重重負下，其自主意識的萌發，而六〇年代童真於香港發表作品往往和香港商品化的市場經濟體制有關，香港大眾文化商品生產模式相當程度影響童真作品的出版。³⁷ 《懸崖邊的女人》處理題材是男女之間的三角戀情，此一作品具有大眾小說公式化「預知性」(predictability)傾向，³⁸ 情節的公式化是大眾文學各種文類作品的一大特質，文本雷同的公式更是讓讀者有相似與熟悉的快感。³⁹ 《懸崖邊的女人》的封面設計也頗具大眾小說的特色，封面為俊男美女的人物肖像圖，如同好萊塢電影海報的手繪圖像，這些郎才女貌再現圖像可看成一種明顯的視覺指標，書中有多幅描繪人物形象插圖，穿插在劇情之中，提供給讀者視覺感

35 也斯，〈從五、六〇年代文化流動的角度看胡金銓的電影〉，邱貴芬、柳書琴主編，《台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04），頁317。

36 羅貴祥，〈幾篇香港小說中表現的大眾文化觀念〉，陳炳良編，《香港文學探賞》（台北：書林出版公司，1994.05），頁23。

37 筆者於2014年7月21日與文訊封德屏總編一起拜會童真女士，進行《文訊》的訪談工作，會後請益童真女士，童真女士也表示相較於她在台灣發表作品的純文學性，於香港發表作品確實「商業性」較強，在此並感謝童真女士餽贈《紅與綠》一書。童真創作歷程訪談紀錄見於王鈺婷，〈鳳凰樹影下的童真〉，《文訊》347期（2014.09），頁99-102。

38 蔡仁傑，〈通俗小說的「文本公式」及其意涵：以Stephen King的恐怖小說*The Dark Half*為例〉，《英美文學評論》7期（2004.04），頁211-213。

39 陳音頤，〈共謀、抵抗或是幻想：快感和通俗浪漫小說〉，《中外文學》32卷12期（2004.05），頁158。

受，並使得讀者通過形象的解讀來閱讀文本，這種封面的呈現並非單一，我們從香港五、六〇年代的文化脈絡，可以理解此類小說的意義和文化涵義。

童真的小說《相思溪畔》，⁴⁰為出版「三毫子小說」的羅斌環球小說王國所出版。三毫子小說曾是香港最流行的流行小說叢書，三毫子小說以言情小說為主，有不少香港作家曾創作三毫子小說，包括：史得（許德）、司空明、望雲、楊天成、鄭慧、依達等，羅斌奉行薄利多銷的原則，訂價便宜，發行量也大，三毫子小說為五〇、六〇年代香港讀者提供十分廉省的大眾娛樂消遣，三毫子小說題材也帶有香港都市五〇、六〇年代風情，是香港通俗文化的典型，⁴¹羅斌的環球出版社為目前三毫子小說研究的一大重點；日前香港學界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也召開相關研討會，探討三毫子小說所展現通俗文學面向的研究成果；⁴²而王梅香開闢出三毫子小說研究的新趨勢，特別關心三毫子小說和美新處的關係，分析美國在冷戰時期的文化宣傳。⁴³劉以鬯1962年在《星島晚報》上連載的《酒徒》，呈現當時六〇年代「四毫子」小說的盛況，也對於當時香港社會文化商品化的現象有深刻的反省，童真的《相思溪畔》，某種程度上呈現出當時香港社會的某些特質，特別是資本主義與文化商品化的現象。《相思溪畔》封底標示為「流行小說」，封面為手繪的男女肖像圖，呈現出大自然樹影圍繞下，英氣勃發的男性與體態健美、時髦艷麗的女性，封面設計新穎活潑，特色鮮明，書中也有配合小說情節的若干大幅插圖，深具趣味性。

《相思溪畔》也展演大眾文化所具有的結構性公式——男女之間的三角關係，在形式、內容與版式設計上，都具有大眾文學的特色，此種型態的小說

40 童真，《相思溪畔》（香港：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1962）。

41 三毫子小說為香港流行的小說叢書，「三毫子」原名為「環球小說叢」，是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的流行小說系列，以言情小說為主。見黃靜，〈「三毫子」的花花都市——五、六〇年代的三毫子小說〉，梁秉鈞策劃，《創意寫作系列：書寫香港@文學故事》（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2008.01）。

42 參見2013年12月13-14日由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舉辦之「亂世桃花逐水流：一九四〇及五〇年代香港廉紙小說的生產與流通」國際學術研討會之相關資料。

43 王梅香，〈隱蔽權力：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文學（1950-1962）〉（新竹：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5）。

反映當時香港都市文化流行大眾讀物的風貌。《相思溪畔》描寫陸秉仁在陰錯陽差之下周旋在林家姐妹之間的愛情故事。《相思溪畔》以「相思溪」作為故事主要場景，小說背景建構在台灣東部，描述陸秉仁任職於東部相思溪畔的工廠，白美是溪畔茶館的侍女，具有東部原住民女性的特徵，因為白美放棄打字員工作成為茶館的茶孃，秉仁一開始對其的印象並不友善，而秉仁和白美有較多深談的機會，發現卸下脂胭的她有股脫俗氣質，正當兩人戀情急遽升溫之時，愛情的衝突來自於親人與傳統社會的目光，其中最大的阻力來自於撫養秉仁長大珣姨的反對，由於秉仁童年時父親迷戀上一冶蕩妖婦，最後散盡家產、終日酗酒後猝死，母親也受不了打擊相繼辭世，在往事的壓力之下，珣姨介紹純樸女學生曼熙給秉仁，以轉移秉仁對於白美的迷戀。

小說塑造兩個女孩有截然不同的風貌，明顯具有強烈對比，一是上進天真的女學生，一是像花蝴蝶般周旋在客官之間的茶孃。貞女與蕩女，原是傳統以男性為中心的價值認知，如同美國女權主義批評家吉伯特與古芭（Gilbert and Gubar）所合著的《閣樓上的瘋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她們探討維多利亞時期小說中的女性形象，認為女性在文學中的形象是為男性幻想的產物，往往被建構成純潔的天使或是瘋狂的怪物兩種形象。Gilbert and Gubar也透過重讀19世紀著名女作家如Jane Austen、Charlotte Brontë等人著作，討論到女性從事文學活動時所懷抱作家身分的焦慮，特別是女性在傳統父權制的標準，如何謀求創造女性形象的權力，而構成女性雙重的聲音之書寫策略。⁴⁴在此童真的聲音也充滿雙重性，一則解構從男性文學中繼承而來的女性形象，特別是貞女與蕩女的對立形象；一則安排女主角白美死亡的結局。小說結尾，秉仁決定與曼熙先訂婚，而後其父驟逝，小說揭曉白美是曼熙的姐姐，白美為了籌措醫藥費和學費，只好犧牲前途到茶室工作，故事終曲白美為了成全秉仁和曼熙，嫁給紈袴子弟，婚後的她並不幸福，最終被突來溪水淹沒而香消玉殞。根據Gilbert and Gubar的分析，瘋癲和死亡是女作家袒露心理的獨

44 （美）桑德拉·吉伯特（Gilbert, S. M.）、蘇珊·古芭（Gubar, S.）著，楊莉馨譯，《閣樓上的瘋女人：女性作家與19世紀文學想像》（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02）。

特方式，女作家採取迂迴曲折的方式來發抒自己獨特的感情，也使得女主角得以拒絕生活在父權文化的敘述結構之內，白美的死也可視為女作家潛意識中被男性話語壓抑的自我陳述。

《相思溪畔》中童真雖然突破男性觀點下女性形象的二元分立，白美之死也是女作家創造力的反映，但是白美的形象依舊維繫在犧牲奉獻的偉大情操上，這種雙重策略也構成童真此部作品的重要特質，並顯示出童真在傳統父權文化與香港社會文學商品化的現象中謀求女性文學的艱難、衝突與矛盾，尤其是童真於香港發表的作品，也與香港大眾文化牽連，並可視為童真在香港環境下尋求發表的一種策略，顯現出童真的作品在進入香港文學場域的過程中，與場域外部條件以及內部文學、美學觀調和與影響因素下，呈現出香港通俗文化文學氣象與氛圍。

五、結語

香港為五、六〇年代台灣島外創作發表的重要園地，童真1955年以〈最後的慰藉〉獲得香港《祖國周刊》短篇小說徵文李白金像獎，是童真與香港文壇接觸的起點，而後1957年至1965年童真在友聯雜誌支持的《中國學生周報》長期發表作品，並以懷鄉主題展現其文學的風貌；而值得一提的是六〇年代童真作品進入香港，也受到香港文學場域的影響，呈現出香港地域性與大眾文化的多元發展，特別是受到香港通俗文化的影響，反映出香港商業化與都市化的文化形態。然而，童真作品跨足「香港」的另類意涵，除了童真在香港文學場域中所凸顯的「香港性」，也在於童真以遷居台灣作家形象進入香港文學場域之中，在此開闢出某種受到香港文學場域影響而又具備特殊性的美學位置，童真作品〈老樹濃蔭〉中就鑲嵌入台灣省籍多元議題，呈現出本省與外省族群交往互動的善意；《懸崖邊的女人》則對於香港虛華社會提出批判；《相思溪畔》女主角設定為台灣東部的原住民女性。分析童真在香港文學場域的定位過程，一方面可以看到香港文學場域結構性的影響，一方面也看到台灣女作家透過區隔（distinction）以正名，帶入其所具有的「台灣特殊性」以彰顯文化差異。童真的「香港性」，和其作品中所具有的「台灣性」實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檢

視童真的文本再現與台港文學場域結構之間的互動，也引發筆者未來進一步從「台灣性」與「香港性」的相關脈絡，作為理解五、六〇年代台灣女作家與香港文壇交流面向一個重要切入視角，以便更細緻定位出台灣女作家於台港文壇互動層面，並審視台灣與香港之間的關係。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邱貴芬、柳書琴主編，《台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04）。
- 范銘如，《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8.08）。
- 張詠梅，《邊緣與中心——論香港左翼小說中的「香港」（1950-67）》（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3.10）。
- 梁秉鈞策劃，《創意寫作系列：書寫香港@文學故事》（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研究中心，2008.01）。
-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11）。
- 陳炳良編，《香港文學探賞》（台北：書林出版公司，1994.05）。
- 童真，《相思溪畔》（香港：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1962）。
- ，《黛綠的季節》（香港：友聯出版社，1962）。
- ，《懸崖邊的女人》（香港：香港鶴鳴書業公司，1962）。
- （美）桑德拉·吉伯特（Gilbert, S. M.）、蘇珊·古芭（Gubar, S.）著，楊莉馨譯，《閣樓上的瘋女人：女性作家與19世紀文學想像》（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02）。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 王鈺婷，〈鳳凰樹影下的童真〉，《文訊》347期（2014.09），頁99-102。
- 林麗如，〈時代的顯影——專訪童真女士〉，《文訊》244期（2006.02），頁20-27。
- 陳音頤，〈共謀、抵抗或是幻想：快感和通俗浪漫小說〉，《中外文學》32卷12期（2004.05），頁158。
- 童真，〈我的創作之旅——一次小小勝利〉，《文訊》28期（1987.02），頁216-222。
- ，〈最後的慰藉〉，《祖國周刊》12卷8期（1955.11），頁25-29。
- 須文蔚，〈余光中在一九七〇年代台港文學跨區域傳播影響論〉，《台灣文學學報》19期（2011.12），頁163-190。

- ，〈1960~70年代台港重返古典的詩畫互文文藝場域研究——以余光中與劉國松推動之現代主義理論為例〉，《東華漢學》21期（2013.10），頁145-173。
- 黃燕萍，〈「南來南國豈為錢」？——從五十年代初香港的難民潮談到南來文人在香港文壇的生存形態〉，《文學世紀》37期（2004.04），頁51-54。
- 蔡仁傑，〈通俗小說的「文本公式」及其意涵：以Stephen King的恐怖小說*The Dark Half*為例〉，《英美文學評論》7期（2004.04），頁209-239。
- 鄭樹森、盧瑋鑾、黃繼持，〈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現象三人談〉，《中外文學》28卷10期（2000.03），頁11-39。
- 盧瑋鑾，〈《中國學生周報》〉，《讀書人》26期（1997.04），頁72-75。
- 鍾麗慧，〈「鄉下女作家」童真〉，《文藝月刊》190期（1985），頁13-20。
- 簡義明，〈冷戰時期台港文藝思潮的形構與傳播——以郭松棻〈談談台灣的文學〉為線索〉，《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8期（2014.04），頁207-240。

（二）學位論文

- 王梅香，〈肅殺歲月的美麗／美力？戰後美援文化與五、六〇年代反共文學、現代主義思潮發展之關係〉（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5）。
- ，〈隱蔽權力：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文學（1950-1962）〉（新竹：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5）。
- 吳佳馨，〈1950年代台港現代文學系統關係之研究：以林以亮、夏濟安、葉維廉為例〉（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8）。
- 詹馨怡，〈童真小說研究〉（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論文，2011）。

三、周刊文章

- 童真，〈一個熱誠的年輕朋友〉，《中國學生周報》589期，1963.11.01。
- ，〈老人與船〉，《中國學生周報》315期，1958.08.01。
- ，〈老樹濃蔭〉，《中國學生周報》325期，1958.10.10。